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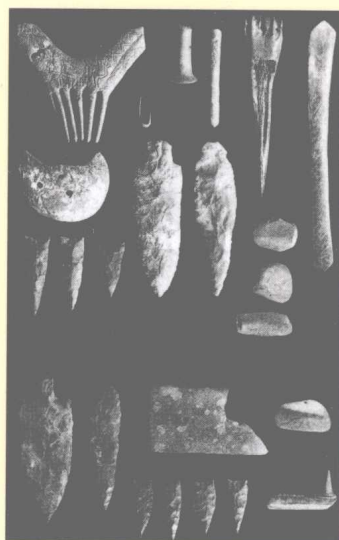
33

IN PURSUIT OF THE PAST

追寻人类的过去

解释考古材料

〔美〕路易斯·宾福德 著 陈胜前 译



上海三联书店



追寻人类的过去

解释考古材料

〔美〕路易斯·宾福德 著 陈胜前 译

IN PURSUIT OF
THE PAST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寻人类的过去/[美]路易斯·宾福德著;陈胜前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3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陈恒、黄韬主编)
ISBN 978-7-5426-2882-4

I. ①追… II. ①宾…②陈… III. 文化人类学—研究
IV. 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7425 号

追寻人类的过去

著 者/[美]路易斯·宾福德
译 者/陈胜前

责任编辑/彭毅文
装帧设计/鲁继德
监 制/李 敏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上海一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640×960 1/16
字 数/280 千字
印 张/20.75

ISBN 978-7-5426-2882-4/C·282

定价:33.00 元

总 序

陈 恒

自百余年前中国学术开始现代转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经几代学者不懈努力已取得了可观成就。学术翻译在其中功不可没,严复的开创之功自不必多说,民国时期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更大大促进了汉语学术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学人开眼看世界,知外域除坚船利器外尚有学问典章可资引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又开始了一轮至今势头不衰的引介国外学术著作之浪潮,这对中国知识界学术思想的积累和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可谓有目共睹。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同时,中国学者在某些领域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论著,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借此如株苗之嫁接,已生成糅合东西学术精义的果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企盼着,既有着自身深厚的民族传统为根基、呈现出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又吸纳了国际学术界多方面成果的学术研究,将会日益滋长繁荣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西方学术界自身的转型也越来越改变了其传统的学术形态和研究方法,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日益繁荣。研究方法、手段、内容日新月异,这些领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取向。不同学科的学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

迫切,以求能开阔视野,迸发出学术灵感、思想火花。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合格的学术翻译队伍也日益扩大,同时我们也深信,学术垃圾的泛滥只是当今学术生产面相之一隅,高质量、原创作的学术著作也在当今的学术中坚和默坐书斋的读书种子中不断产生。然囿于种种原因,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并不平衡,学术出版方面也有畸轻畸重的情形(比如国内还鲜有把国人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论文系统地引介到学术界)。

有鉴于此,我们计划组织出版“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将从译介西学成果、推出原创精品、整理已有典籍三方面展开。译介西学成果拟从西方近现代经典(自文艺复兴以来,但以二战前后的西学著作为主)、西方古代经典(文艺复兴前的西方原典)两方面着手;原创精品取“汉语思想系列”为范畴,不断向学术界推出汉语世界精品力作;整理已有典籍则以民国时期的翻译著作为主。现阶段我们拟从历史、考古、宗教、哲学、艺术等领域着手,在上述三个方面对学术宝库进行挖掘,从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以求为 21 世纪中国的学术大厦添一砖一瓦。

序

宾福德的工作证明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杰出的考古思想家。从上个世纪 60 年代开始，“新考古学”兴起，作为主要和最具有原创性的人物，他的影响比任何关注人类早期历史的学者都要大得多。

为本书作序让我有机会指出为什么这本书对现代过程考古学是如此重要，它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人类的位置。对许多人来说，考古学最吸引人地方就是获得发现时的兴奋——发掘出过去遗失的宝藏。在荒僻的地方冒险发现新东西的确有一种让人难以忘怀的愉悦。但是这仅仅是开始，就像宾福德在本书中指出的一样，这不是本项事业中最重要或是最有趣的部分。因为考古学的任务不是单纯地“拼合过去”——只要把实物材料一挖出来，就像拼图一样不费什么心血就可以拼成一幅完整的历史图卷。正相反，真正的工作是一种挑战，一种持续的挑战，把考古材料以一种相互关联、合理的方式缀合起来，从中寻找意义和进行解释。考古学实践中真正智识上的兴奋点——与沮丧来自于同一种矛盾，一方面证据很丰富，而另一方面从中得出可靠的结论异常地困难。这是智识上的探索，最终比一味地发掘寻找新的发现更有价值。

我认为此书非常重要，原因之一是它非常清晰地表达出——比此前任何著作都要好——寻求考古材料的意义始终是考古学中最基本的挑战。只有克服这个困难，我们才可能对人类早期的历史和影响至今的发展历程获得深入的理解。此外，这本书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读起来妙趣横生。

宾福德是一个全身心投入到考古学研究中的人，对他来说，考

古学不仅是一个行动的主题，而且还是一个思想的领域。这个行动所涉及的不只是发掘与通常的考古学研究，而是民族考古学——在当代狩猎采集群体和其他非西方式的生计经济体中去生活和工作——这意味着他经验丰富、视野广阔。

我很清楚地记得作者对英国的首次学术之旅，那是1971年12月设菲尔德的考古会议。在报告中他就法国莫斯特时期的考古证据进行了深入的解释（参见本书第四章），如果进行一些技术性的处理，报告会很生动的。而会议前一天晚上在我的家中，我们四个人围坐在餐桌旁边。宾福德描叙他在努那缪提（Nunamut）爱斯基摩人中的经历，餐桌上蜡烛越烧越少，但是我们谁都没有离开的意思，直到凌晨三点左右，蜡烛一根一根地熄灭，新的一天来临。回忆起那个夜晚，至今兴趣盎然、历历在目，感觉真的非常美好，因为其中有许多亲身经历的考古学、贴近生活的考古学——我们已经形成的关于人类过去的观念被他的野外经验改变了。我相信这种个人之间亲密的感觉最好是用口头来表达，当然此书也是如此传达的，因为书中许多章节都是讲演的内容，编辑在编者注中也提到了。1980年秋季学期南安普敦大学考古学系所有同仁都在他的讲学中深受启发、获益匪浅，这些章节也同步完成。我想这本书保留了大部分个人交流讨论中的那种急迫感、攻击性和辩论力量。因此，它可以作为一位世界顶尖的考古学家所从事主要工作的记录来阅读。我想，读完此书，没有人不会对人类早期历史以及对知识所依赖的证据产生某些新的认识。

当然，作者工作的重要性并不主要存在于单个研究项目趣味横生的描述之中，而是存在于对于新考古学基本要义的反复陈述和例证中。自1962年以来宾福德一直主张这些要义，而且它们已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研究。

对于新考古学，也许称之为过程考古学更好，必须认识到的最重要的事是：刚开始的新鲜感已经消退了，留下来的很大程度上是一系列关于人类过去的问题。新考古学最初并不是一个一致的理论体系——这一点经常被误解、歪曲——这个理论体系是非常缓慢

地克服许多困难后逐渐形成的。正相反,它坦率地承认我们并没有一个很容易得到的或者现成的方法去建立关于人类过去的合理的知识。宾福德非常清晰地指出,我们所有关于人类早期历史的知识,或者说所有我们相信的东西都立足于推理。现在看来许多早期的研究者,从考古学之父皮提-里福斯将军(General Pitt-Rivers)和奥斯卡·蒙特留斯(Oscar Montelius),到我们这个世纪的戈登·柴尔德或是瓦尔特·泰勒已经对考古学理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给人一种印象,他们已经建立了一套正确的程序,或是说一套规则,我们似乎可以由此向前去“做”考古学研究,重建人类的过去。而宾福德反复强调的是我们还没有这样的规则:这些规则让我们可以离开对考古材料的观察,通过可靠的推理过程就可以对人类的过去做出准确的陈述。

上面这句话似乎说得有点过分,关键之处也许不是它过于大胆的揭露,而是它事实上是新考古学的一个基本观点。这在本书的第二章说得很精彩,它也归纳了宾福德最近的著作《骨骼:古代人类与现代神话》,把我们的祖先置于和我们以往不同的认识中。观点的表述明白晓畅、紧凑有力,所以我想这本书能给我们一个罕有的视角去了解当代考古学思想舞台上的挑战与争论。

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

作者致谢

这本书的论题比较广，它讨论了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以及一些我们探索它的尝试。正因为如此，它代表了我的职业生涯中作为民族志工作者、动物行为研究的学生和考古学家的个人经验。这里我必须感谢所有让这本书成为可能以及在此过程中给我不断鼓励的人们。特别是由于科林·伦福儒、罗宾·托伦斯、约翰·切利的劝说，这本书才会存在。他们三人出力最多，他们让我把欧洲之行的讲座录音，并认真考虑作为一本书的基础。他们三人不知疲倦地支持、鼓励我并且坚持这本书必须形成。我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我在欧洲时，科林·伦福儒、克利夫·甘博(Clive Gamble)和卡拉夫斯·兰德斯博格(Klavs Randsborg)就欧洲的知识分子氛围指导我、纠正我、教育我。就此我非常感谢这些朋友。欧洲之旅还让我有机会在1980年新年除夕与丹丽丝和弗朗斯瓦·博尔德共享丰盛的午餐。这是一次难忘的聚会，很不幸这是我最后一次与在世的弗朗斯瓦见面。有机会访问欧洲，我非常感谢我的接待方。

正如前言中提到的，这本书中我参考了大量还未完成的研究，一个重要的部分来自于或者受启于1981年夏神奇的南非之行(开普敦大学讲座邀请的结果)。在访问过程中，我有幸去了南非北部的诺思比河(Nossob River)地区，那里我分享了自然学者伽斯(Gus)和马姬·米尔斯(Margie Mills)的经验，他们当时正在研究鬣狗。我还被特许访问了C. K. 布赖恩博士(Brain)，以及伊丽莎白丝·沃格特博士(Elizabeth Voigt)与伊丽莎白丝·弗巴(Elizabeth

Vrba),他们都在全斯瓦尔(Transvaal)博物馆工作,我也因此能够去看了克罗姆特莱(Kromdraai)、斯得克方丹(Sterkfontein)和斯瓦特特朗(Swartkrans)这几个遗址,并且得到了这几位世界上最博学的学者的指导。理查德·克林(Richard Klein)和开普敦南非博物馆的员工让我有机会研究收藏在这里的动物遗存,其中包括来自于重要的卡拉西斯河口遗址的材料(关于这批材料我不久将报道出来)。南非博物馆的肖(Shaw)小姐在照片和民族学材料的检索上非常热心地指导了我。

许多人集体的努力让我的非洲之行成为可能,这些也反映在这本书中。当然,首先我要提到约翰·帕克顿(John Parkington),是他安排了这次旅行,并且让我在那里能做许多事。对约翰我真是非常地感激,因为这是我职业中最激动人心的经历之一。

在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许多人对这本书的出版很重要。我必须提到新墨西哥大学的教学媒体办公室(Instructional Media Office)的工作人员,他们把我的绘图变成照片,把我的幻灯片和照片变成精美的印刷品,在此过程中成了我亲密的同事。新墨西哥大学人类学系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的研究。特别是他们为摄影工作提供了许多资金,还派了一个助手来帮助我准备书稿以及其他正在进行的研究。我的打字员,玛沙·格拉翰姆(Martha Graham)和希娜·纳拉尔德(Signa Larralde),长时间努力工作完成了一部很好的书稿。

还有几个人为此书提供了照片:Charles Amsden, Jim Chisholm, Irvn De Vore, Pat Draper, Diane Gifford, Robert Hard, Susan Kent, John Lanham, John Parkington, Edward Santry, Olga Soffer, Norman Tindale。所有不是作者拍摄的照片都注明了拍摄者。他们的工作让我能出版一本更好的书,我谢谢他们的帮助。伊娃·艾伦·莫里斯(Iva Ellen Morris)绘制了几幅早期人类生活的复原图(图2、5、16),还有那幅富有想象力的“伊甸园”插图(图128),我非常欣赏她的才华并感谢她的帮助。

最后,我必须强调罗宾·托伦斯和约翰·切利在成书过程中的重

要作用。他们指导磁带的转换,把口语转换成文稿。在我修改这些文稿的时候,他们已经为编辑本书工作了很长时间,并对内容的重新组织提出了建议,以求更好的版本。在此我对罗宾和约翰的工作深表谢意。

编辑手记

先说说这本书是如何写成的以及我们在成文过程中的作用，对读者来说应该有所帮助。宾福德教授于1980年10月到1981年1月访问欧洲，这期间他给大量的公众以及少数的专业人士群体讲述了他做过的和正在做的研究。他给本科生开课、与研究生和大学老师讨论，还向无数的考古听众发表演讲。所有场合中反应都非常热烈。对我们这些有幸聆听宾福德教诲的人来说，他受到热烈欢迎并不令人惊奇：他有着巨大的力量能让过去“复活”，他立足于考古学上重大的争论，并且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论上非常具有独创性。

由于科林·伦福儒的远见，我们对宾福德教授在南安普敦大学（他的欧洲之行的主要接待研究机构）的许多讲座都进行了录音，希望在此基础上编辑成文出版。当然，这些磁带数量太大，如果没有大量的编辑工作是无法出版的，工作上的压力让宾福德很难独自完成这项任务。由于我们很了解他，对他的工作和考古学的一般方法很着迷，同时也由于我们参加了他在英国的绝大部分讲座，于是我们被请求协助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把20多次讲座的录音带转换成一本从门外汉、本科生到考古学专业人士都能接受的书。我们的任务包括给报告录音、建立磁带文稿（大部分情况是把录音撰写成文稿）、统一出版格式，然后把文稿拼成一本书，最后，我们把这个非常初步的草稿交给作者。1981年夏他把稿子带到南非，仔细斟酌之后，他又修改了几章（主要是扩充），在每个部分之前加了导言，另外添加了两章与脚注，还挑选了一些插图。从这个有了

很大提高的素材的基础上我们重新编辑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主要的工作是保证前后文的一致,在必要的地方,把著名的宾福德文风(他的口头表达中很少有这个问题)尽可能地转换成易于理解的文字。这是一项比我们预想的要耗时得多的工作,但是有机会逐字逐句检查在我们这个领域得到广泛承认的领袖的思想,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把单个的章节跟相关的材料讲授的场合联系起来有点意思。第一章来自于1981年BBC的三次广播讲话,发表于*The Listener* (1981年4月第9、16、23三期)。第二章最初是两次在南安普敦大学给本科生的旧石器考古讲座。第三和第四章是特别为这本书而写的;前者结合了宾福德1981年夏南非之行中的观察和思考。作者在阿姆斯特丹的阿尔伯特·伊格斯·冯·吉芬(Albert Eggs van Giffen)史前和原史研究所讨论课的文稿稍加修改成了第五章。在设菲尔德大学史前史与考古学系的一个讲座成为第六章的核心,而第七章是根据在设菲尔德和南安普敦对普通公众的讲演和在伦敦史前学会上的一个谈话综合而成。第八章来自于伦敦经济学院由恩斯特·格勒尔(Ernest Gellener)和约翰·霍尔(John Hall)组织的“历史中的模式”系列讲座,但它同时还包括阿姆斯特丹一个讲座之后讨论的部分内容。最后,第九章是从南安普敦大学给本科生的非正式讲座磁带中节选出来的。

我们感到最后的成书很好地显示了作者广泛的研究兴趣。这里有些东西适合所有考古学的口味——从我们最早的祖先的生活,到农业起源、再到文明发展的问题,有的考古学家喜欢称之为“复杂社会”。此外,路易斯·宾福德还指出我们用以研究人类过去的证据,也就是考古材料,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他将之比喻成还没有解读的古代语言。这本书的目的——实际上宾福德已做过和正在做的大部分研究——就是去寻找解读那种古代语言的方法。

约翰·F. 切利(John F Cherry)

罗宾·托伦斯(Robin Torrence)

前言

这本书是1980年夏和1981年的头几个星期在大不列颠和斯堪的纳维亚一系列讲座的修改文本¹。这些讲座设定了许多目标，但首要的任务是要阐明最近的研究进展，即我正在进行研究的课题或是我正在探索的观点，还没有形成论文或是专著。这也意味着这本书不像已经完成的研究一样，汇聚各种观点和研究进展，评论相关的研究。我们都知道考古学家出版著述常常是工作完成许久之后的事；类似之，启发灵感的讨论和交流，这些构成研究乐趣的东西往往只在朋友和同事“圈内”才会有，直到所有的工作完成之后，迟到的报告出版之前，很少会播之大众。讲座则填补了研究的乐趣与准备最后报告的乏味之间的空白。我希望通过出版我现在的思考和研究，能够和大家分享一些研究的乐趣，也希望别人能够得到这些未完成的工作的启发。为了阐明我论述的线索，我准备了充分的背景信息，但是我通常并没有给出“结论”：事实上，有时我并不知道结论是什么。因为我的经历和当前的研究兴趣，我对他人研究工作的批评态度也有所缓和，就某些领域的研究我采取了一种“艺术的表达”。

许多年前我制订了一个长期的研究计划，其中包括考古遗址动物遗存的调查、遗址空间组织的使用分析和文化系统的生态学研究，一般认为它们是发展考古学解释理论最有前景的领域²。我已经发表了大部分动物遗存方面的研究（还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涉及到掠食作为一种寻食策略的判断标准问题，还没有发表）。书中大部分的讨论运用了以动物遗存为中心的研究成果，但其主要关注

的还是遗址的空间分析,理解遗址之内和遗址之间的变化。一个近乎完成和一个正在进行的研究,都强调运用生态学的方法。我的长期研究计划中的这个立场决定了那些我认为有趣的和随后值得讨论的东西。

除了一系列对当前研究的简单回顾和必要评论,有时我还不得不针对听众的特征适当调整讲座的难度。几乎所有的讲座都要面对非常不同的听众,他们对考古学与史前史的熟悉程度也差异显著。而另一个方面,就是在座的专业人士中也是差异纷呈。欧洲同行的多样性让我感到惊奇,不仅在于他们的研究兴趣,更在于他们对于自己专业之外相关研究的认识上。由于大部分北欧地区旧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存非常罕见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因此正如所料,这里的考古学家研究兴趣更多集中在农业和早期城市考古之上。而在南欧或是非洲史前史学者圈中这种侧重倒是不大明显。类似之,对石器时代研究有兴趣的考古学家更可能在研究中石器时代的遗存,也就是,处在前农业阶段现代人的考古遗存。我发现他们对本书第一和第二部分的讨论不甚关注,也许他们认为我所运用的材料、讨论问题的方法和他们的研究工作关系不大,也有些人纯粹因为对莫斯特时期或是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学术关注表现出一点兴趣。我在研究北美古代(Archaic)和林地(Woodland)期考古时,一群新大陆考古学家中也是如此反应,尽管遇到过类似的事,但是这种反应还是有点出人意料。针对这种情况,我在书中讨论早期人类和莫斯特时期时,主要讨论方法论,我相信这和所有考古学家都直接相关,不管他们关注的是哪个时期。

我不知道如此之多的人不熟悉狩猎采集社会的民族学材料。他们关于狩猎采集者考古遗存的讨论对我来说常常是模糊的或是不着边际的,都不是来自于第一手材料。正因为如此,我用了大量的和狩猎采集者共处时拍摄的幻灯片,努力来说明流动的狩猎采集者是如何利用他们的环境并留下考古遗存“标志”的。这在第六章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我有意以幻灯片的方式来显示一个群体的人如何导致了如此众多且差异明显的考古遗存。这个事实——尽

管对考古学家来说并不陌生——然而在解释考古记录时很少被理解和认真地考虑。我也许有点夸大其辞，听众中的考古学家大部分对流动的人类群体并不关心。但是我的讲座应该被视作一种类似传教士的工作，其中指出了在狩猎采集者研究中产生的推理方法上的一些难题。

许多欧洲人，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希望我谈谈新考古学。然而这并不是我1969年以来发表文章中强调的问题，而是Fritz、Plog³、Watson、LeBlanc和Ledman等人概括出来的论题⁴。大部分欧洲学者似乎认为这本书正好代表幼稚的实证主义，一种让考古学成为“科学的”愿望或是某些奇怪的美国人去“测量事物”的冲动。我承认如果目标，也就是目的论不清楚，是很难兜售一套研究策略的：除非你能告诉我往哪里走，否则我不能评估你的建议。在这个意义上，许多新考古学的纲领可能是不合时宜的，而且也确实引起了一些负面的反应。

针对这些情况，我试着用事例来组织这本书，强调不同研究方向中考古学难题的共同性质。与此同时，我尝试着把考古学家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和共同的兴趣联系起来，丰富考古推理的方法。文中我没有单独讨论认识论，只是在实践和方法上进行了有限的论述。如果读者更欣赏后者，那么对认识论的涉及就不可避免了。我坚信对认识论关注和实践对考古科学的发展至关重要。直接呼吁采用某种实证主义方法可能还不成熟，而且许多考古学家无论如何也不会欣赏这种举措。文中我运用一系列推论范例希望说明认识论必不可少。

欧洲似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考古学家：考古专家或是技术工作者，他们代表“考古学中的科学”和“社会哲学家”（结构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形态发生论者（morphogenesisists）”等）。本书试图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建立一门真正的考古科学（science of archaeology）⁵。这不是说这两类考古学家仅见于旧大陆——实际上也存在于北美。“努力发掘的田野人”在各式各样的墨西哥或是南达科他酒吧里讨论酒精的浓度，而所谓的“理论家”们不管有没

有可靠的方法就想获得“它都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的答案(谢天谢地!旧大陆的考古学中更少“大男子气概”,这里的科学家和社会哲学家比新大陆的“田野人”对知识问题更有兴趣)。

英国的“考古科学”方法相当普及,很明显,这似乎表明发展考古推理方法的途径要依赖于其他科学领域。因此,这里强调动物考古学、地质学,以及其他“服务于”考古学的科学。从某个角度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正确的方法:其他科学领域中,从现象观察中产生的理论和解释完全可以作为考古推理的基础。然而,我们常常发现,从其他学科中获得的推理方法对考古学家解决自身难题来说,不是毫无用处,就是要削足适履。结果是那些处理考古遗存的、并不关键的技术领域得到稳定的发展,但没能有效地促进考古学本身的成长。而且考古学的证据和其他学科的目标往往不相干——例如,家牛、绵羊、山羊的杂交分化过程纯粹是用动物学的术语来研究的,考古学家只能胡乱摸索,偶尔才能用上动物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

正是因为如此,我决定去研究动物遗存,出版了《努那缪提民族考古学》(*Nunamiut Ethnoarchaeology*)⁶和《骨骼》(*Bones*)⁷这两本书。科学家从来不会把动物遗存与过去人类社会的解释结合起来,虽然这是非常必要的工作。他们最多发展一些解释古代动物种群变化的方法⁸,但是——啊哈——因为没有对考古遗存形成过程的深入理解,所有他们能达到的程度也值得怀疑⁹,即使相关的科学领域也许会协助考古学,偶尔还会提供重要的“礼物”,但是只有考古学家才会为实现考古学的目标去做那些必要研究工作¹⁰。

我想大部分的考古学家已经认识到,推理人类过去的可靠性只能建立在推理所依赖的知识基础之上。长期以来,大家都知道我们关于某些现象的知识比另一些知识要更加可靠。1954年克里斯托弗·霍克斯(*Christopher Hawkes*)¹¹在提出“可靠性的等级(*ladder of reliability*)”时就曾暗示:对于那些知识和理解相对可靠的领域来说,推理会相对要容易一些。

我在南安普敦的时候,有幸参加过一次讲座,非常清楚地见证